

壮族历史 文化的考古学研究

郑超雄 覃 芳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壮族历史文化的考古学研究/郑超雄,覃芳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6.3

(中国壮学文库)

ISBN 7-105-07546-5

I. 壮... II. ①郑... ②覃... III. ①壮族—民族历史—研究②壮族—民族文化—研究 IV. K28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43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绿冬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518 千字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36.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编一室电话:64271909;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壮族是古越族系统的一个支系，古越族在秦汉前后分布面积很广，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有越人的不同支系，史称百越。百越是一种泛称，分布的地域广阔。《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语：“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历史上越族族称很多，纷杂难辨，但就其居住地域和文化形态看，大致可分为东越和西越两大系统。东越即吴越系统，其地域包括今日的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西越即西瓯、骆越系统，其地域包括今日的广东、广西、海南、湖南、贵州、云南及东南亚部分地区。东越与西越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习俗，更多的是各具特色的文化习俗。其共同的文化习俗是：“文身剪发”、悬棺葬、“善行舟”、“饭稻羹鱼”等；不同的文化是：东越善铸铜戈、铜剑、铜钺、有段石镞等；西越则善造铜鼓、羊角钮钟、有肩石器、祭铜柱、信鸡卜、崇敬蛙神和鬼神、行屈肢蹲葬和截体葬等。由于受长时期的汉文化持续南迁的影响，绝大部分的越人皆已融入汉族之中。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原来是越人势力最强大的地方，曾建立有吴国、越国、闽越国、南越国等政治实体，吴国和越国还北上问鼎中原，雄霸一时。然而，时至今日，上述地方已全部汉化，很难找到昔日越文化的印记。壮族与同属壮侗语民族的布依、侗、水、仫佬、毛南等民族，是古越族的延续后裔。他们至今仍保持和传承着旧有的文化传统，如桂西及云南文山壮族每年的击铜鼓祈年活动，东兰、南丹县壮族的“蚂拐节”活动以及鸡卜习俗等。据此可知，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研究壮族的历史文化，对于了解我国南方百越族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因为壮族文化几乎就是南方百越族群的“活化石”。

壮族人口约有 1600 多万,主要聚居在广西及云南的文山州,湖南、贵州、广东等省也有少量壮族。据调查,广东、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壮族都不是唐宋以前的原住民族,而是明清时期从广西百色、河池征调的土兵遗民。在广西东北部地区的贺州市也有少量的壮族村落,这些壮族也和湖南、广东的壮族一样,都是明清时期从桂西地区迁徙来的土兵遗民。举出这些例子仅仅是想说明,上述地区尽管已没有壮族居住,但在历史上,这些地区都是壮族先民苍梧、西瓯、骆越原居地。约在秦汉以后,中原大批汉人南下,在上述地区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在此政治环境下,有一部分壮族先民向西部迁徙,而大部分人则融入汉族之中。今日的粤语方言中,仍有不少的壮语词汇。另外,在上述地区保留有众多的壮语地名,无不说明壮族曾经是那里的原住民族。因此,在用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壮族的历史文化时,就不能局限于今日壮族的分布区域内的考古发现材料,而应采用历史的眼光,将视觉扩大到古代壮族先民活动的所有范围内,获得可信、全面、真实的效果。

壮族与同根生民族分布区域内,有两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其一是史前时期的两广类型有肩石器;其二是青铜时代的铜鼓文化。考古学将有肩石斧、有肩石镞、有肩石铲、石钺等统称为有肩石器。它们共同的特征是器身上部都有肩,这是生产工具由手握发展到装柄使用的进步结果。广西有肩石器非常流行,分布很广泛,年代也最早。在 49 县市 157 个地点共发现有肩石器 533 件。其最早年代在距今 7450~9235 年之间。珠江三角洲的有肩石器出现最早的时间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按南海西樵山遗址测定的年代,当在距今 6000 年左右。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也是有肩石器分布区,但年代较晚,距今约 4000 年。另外,在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印度阿萨姆邦等,都有两广类型的有肩石器分布,年代也是在距今 4000 年左右。在史前有肩石器文化的分布区域内,同时也是

青铜时代铜鼓文化的分布区域。铜鼓文化起源于云南、广西地区，是滇越、骆越、西瓯民族的文化奇葩。在时间上，铜鼓文化是在有肩石器文化之后出现的，两者应当有文化传承关系。

在壮族分布地区，有着丰富的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中，哪些是由壮族缔造？哪些是由外来民族缔造？这是必须说明的问题。关于“居住在一个地区的种族及其先民是否是该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创造者”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早在 20 世纪初，就有人注意到这一问题了。1929 年，针对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利用考古学材料来鼓吹日耳曼民族威风凛凛征服世界的谬论，著名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柴尔德（V. G. Childe）曾提出：考古学文化可能相当于古代的某个族，但决不能简单地把文化与种族等同起来。他认为，只有当某一考古学文化经常地独与某种具体的特殊体质类型的骨骼遗存共存时，我们才可用“种族”一词来替代“族”。苏联学者甚至反对把考古学文化等同于“族”，认为某一考古学文化范围内物质文化的典型形制（陶器、饰物等）的相似，决不能全部表明这个“文化”的所有者属于一个族的共同体。但英国的分析考古学家戴维·L·克拉克（Derid clerk）却不赞成这样简单地把考古学文化与种族割裂开来。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精确地确定两者的界限，并且指出，在科学地对考古遗存的单位进行界定之后，就可以发现，考古学中的“文化群（Culture）”基本上是与“种族（Race）”相当的；而“亚文化（Subculture）”则相当于“亚人种（Subrace）”，考古学的文化与人种之间的某个单位相当。^① 实际上，一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该地区种族是否相当，应当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无端否定或肯定，而其间的体质人类学及文化传承学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本着这个态度来探讨壮族地区发现的考古学文化与壮族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① 引见焦天龙：《考古学文化与古代人种》，载《中国文物报》，1989. 4。

有人将广西现代壮族的体质特征与柳江人、甌皮岩人、昙石山人、河宕人进行比较,指出甌皮岩人与现代广西壮族相比,二者在最小额宽、垂直颅面指数、面角、眶指数、鼻指数等方面十分接近,二者均属中眶型、阔鼻型。这意味着现代壮族很可能有甌皮岩人的血统。壮族在头长、头长高指数、头宽高指数、颧宽、上面高、鼻根指数等项更接近于较甌皮岩人晚的河宕人,显示了这种渊源关系。而自甌皮岩人往前追溯,甌皮岩人在接近上面型的上面指数、阔鼻型的鼻指数、低的鼻根指数和实颌型的齿槽面角等方面,表现出若干赤道人种倾向,恰与旧石器晚期的柳江人接近。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甌皮岩人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发展而来的。这种承继关系表明,生活在广西新旧石器时代的居民是土生土长。壮族是广西的土著居民,其渊源不仅可追溯到甌皮岩人,而且与柳江人为代表的广西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也有传承关系。^① 又有人用现代壮族颅骨的主要特征与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和柳江人颅骨化石比较研究,结果发现,现代壮族与柳江人比较接近,而与山顶洞人相去甚远。^② 以往学者也多认为壮族是广西的土著民族,但仅能从有文字的记载中,根据族称的变化将壮族的确切历史追溯到商周时期,现在则可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柳江人,这是现代科学的重大贡献。

柳江人以前有距今 80 万年前的百色旧石器文化遗址,但在百色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没有发现人类化石,就此而言,百色旧石器文化的缔造者是柳江人的祖先,或者说是壮族先民,这是无法用否定或肯定回答的问题。但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看,前者与后者似乎有某些联系。如百色人都是选择有自然光面的砾石来制造石器,与柳江人同时期的旧石器晚期的广西古人类,也是用砾石来制造

① 蒋廷瑜等:《广西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见《史前研究》,1984(2)。

② 朱芳武等:《广西壮族颅骨的测量与研究》,载《人类学学报》,1989(2)。

石器,而且,后者的石器加工技术与前者也相近似。这种情况一直影响到以后的整个石器时代的石器加工技术。因此说,百色旧石器是否是壮族先民缔造,尚待有新的考古学发现才能作出较准确的回答。目前我们只能说,百色旧石器是壮族地区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壮族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

岭南地区在先秦时期,尚未纳入中央集权版图,在这里出现了众多的古国、方国实体。他们也和中原地区的古国、方国性质一样,有自己的青铜文化,有自己的文明运行轨迹。现代人喜欢用数据来说明问题,如果我们用数据来比较秦平岭南战争和秦平东方六国战争,就会发现,秦平岭南战争所需时间远比秦平六国战争花费时间多。秦始皇于公元前 230 年灭韩;于公元前 228 年灭赵,前后用 2 年时间;于公元前 225 年灭魏,用 3 年时间;公元前 223 年灭楚,用了 2 年时间;公元前 222 年灭燕,用 1 年时间;公元前 221 年灭齐,用 1 年时间。秦灭东方六国前后总共用了约 10 年的时间,而秦瓯战争则用了约 5 年时间,再加上秦军与骆越方国的战争,竟用了 6 年的时间。通过数据比较可知,当时的西瓯、骆越方国的经济基础、战争机器、制度文明程度并不亚于东方六国,正像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所说的:“距今二千多年前秦在岭南设郡的背景,其性质与秦并六国相同,是在其条件业已具备的情况下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①西瓯、骆越是壮族的直接先民,此说在学术界已形成共识。据此可知,先秦时期岭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无疑也是壮族先民所缔造。

秦汉以后,岭南纳入中央版图,秦汉王朝在岭南地区推行封建郡县制。在考古学方面,大量的汉墓出现,墓中出土有众多精美的文物。这些文物对了解当时的历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出土文物中,哪些属于壮族文化,哪些属于汉族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文化。有人指出：“广西的汉墓很多，这些墓葬群有不少就在现在的壮族地区。从目前出土的文物看，不少与中原内地相同，一概把它们看成是汉族的或是一概把它们看成是壮族的看法都是片面的。”^①实际上，秦汉统一岭南以后，从北方来的官员、军人、百姓等，并不是自围栅栏，内外隔绝，居住在孤岛上。而是广泛与越人接触杂居，将越人编籍入户，以便管理纳赋。一些越人贵族，也被委任为汉朝官员，参与上层行政管理。这在考古学上是有所表现的。如贵县罗泊湾一号西汉墓，是目前所知广西最大的一座汉墓。墓中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的铜鼓、羊角钮钟、铜桶、盘口铜鼎、殉葬者的7具圆木棺等，明显具有越文化特点。据此，有人认为墓主是西瓯首领。而墓葬形制及其他大部分文物又具有汉文化特点。又因为该墓葬位于现今贵港市区附近，这里是秦汉时期桂林郡治地，墓中一些器物上写有“布山”字样，“布山”即布山县，当时的桂林郡治就在布山县境内。据此，有人认为墓主是汉族。关于墓主的族属问题，有一个证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在该墓出土的一件铜盆上，用漆绘有几组有关战争和狩猎的图画，学术界都认为是墓主人生前生活写照，画中的主人公即是墓主人形象。画中主人公头剪短发，身穿短袖短裤连衣股服，跣足；画中其他随从人员，有些仅在腰间围一块布，其余全部裸露，显然都是史籍所载的越人形象。如果结合墓中出土的铜鼓及殉葬用的圆木棺分析，墓主应是越人而不是汉人。不可否认，秦汉时期岭南郡县的地方长官中，有大部分是汉族，这些汉族官员任职满后一般都返还原籍，死后也葬在原籍，相信也有客死岭南职上的，但考虑到汉时厚葬成风，皆因汉武帝倡导儒家孝道所致，客死岭南的汉族官员，必也叶落归根，后人将其运回原籍伴祖而葬。如后来唐朝时期的柳宗元，在柳州

^① 蒋廷瑜：《从〈壮族简史〉所用考古资料谈壮族古代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学术论坛》，1984（4）。

任刺史职,客死柳州,家人将其尸体运回数千里远的山西老家安葬,相信汉代岭南的官员也是这样的。排除上述因素,我们有理由认为,壮族地区存在的汉墓,有相当部分的墓主族属应是越人。尽管墓中出土文物有相当多的汉文化因素,也只能理解为政治的统一导致文化统一的结果。秦汉以后的岭南文化,是汉族与越族所共同创造的,这里出现的考古文化,可作为汉族历史文化的资料,也可作为壮族历史文化的资料。

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主要的是以物论史,这就给壮族历史文化系统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如有些历史时段发现的考古文化遗存遗物多,而有些时段的考古文化遗存少甚至没有。本书遵循“有物者多论,无物者不说,以物为据”的原则。这样,书中章节有重有轻,不甚协调,还望读者见谅。

《中国壮学文库》序

壮学是在传统壮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升出来的新兴的概念,是一个新时代的学术话语。它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广西壮学学会的成立,而逐步步入学界视野的。它的产生和成长是学术发展的必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它的构建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一、壮学:民族学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

壮族是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共有壮族人口 16,178,811 人,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 105,226,114 人(不含台湾省的少数民族人口)的 15.38%。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壮族最集中的地方,共有壮族 15,600,854 人居住于广西各地,占广西少数民族人口的 85.7%,占全国壮族人口的 96.43%。其分布状况为桂西稠密,桂东、桂北稀疏。在广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90% 以上的县,有靖西、天等、德保、大新、隆安、龙州、平果、忻城、那坡等县;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90% 以下、80% 以上的县市,有田东、田阳、邕宁、武鸣、东兰、上思、凭祥、扶绥、上林等;还有 14 个县市区的壮族人口占总人口 80% 以下 60% 以上。除广西外,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麻栗坡、马关等县,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永胜县、云县,贵州省从江县,四川省宁南、木里、会东、会理等县,陕西省柞水县红岩寺兰家湾等地也有少量壮族分布。

壮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其族源不仅可以上溯到有史时期的“西

瓯”、“骆越”，而且可以追溯到岭南的史前人类。千百年来，壮族及其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或镌刻在祖国的锦绣河山，或以“西瓯”、“骆越”、“乌浒”、“俚”、“僚”、“徕”、“僮”等名义，甚或是以“蛮”的名义，记载在历代史籍当中，凭由人们对之考证和探究，为之感叹和自豪。

然而，对壮族及其先民进行的历史并不长。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壮族研究是在 19 世纪末伴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脚步而到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如同人类学是“殖民主义的产儿”(the child of colonialism)一样，壮族研究也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沿印度洋和太平洋自西向东扩张，在瓦解了印度、瓜分了东南亚之后，把贪婪的目光盯向了中国大陆。为了巩固他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统治，打通一条由东南亚直入中国腹地的通道，他们开始研究我国南方各省的历史、地理、民族、语言、习俗等问题，以作为军事侵略的先导。这些研究当中就包括了对壮族的研究。1885 年英国伦敦出版的柯奎翁(A. R. Colquhoun)著的《在掸族中》(Amongst The Shans)及伦敦大学拉古伯里(Tettien de La-couperie)教授为该书所写的导言《掸族的摇篮》(The cradle of The Shan Race)是目前所见的涉及壮族的最早论著。此后，法国人邦德里(Pierre Lefevre Pontalis)1897 年在荷兰发表的《泰族侵入印度支那考》(L' invasion Thaie Indochine)、英国人戴维斯(H. R. Davis)1909 年在英国剑桥出版的《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Yangtze)、美国人杜德(W. Clefton Dodd)1923 年在美国依俄华出版的《泰族——中国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英国人吴迪(W. A. R. Wood)1926 年在伦敦出版的《暹罗史》(A History of Siam)都论及壮族的族源和分布。

继西方人研究壮族之后，泰国人也加入了此项工作。有“暹罗

历史之父”之称的泰国共丕耶吗銮拉查奴帕亲王在 1925 年出版的《暹罗古代史》中,有相当的篇幅论及壮族。接着,泰国拍耶亚奴曼罗阁吞写了《泰掸族系考》一文,大量论述了广西等地壮族的情况。然而不论是西方人,还是泰国人,这时的壮族研究仅限于族源和分布,研究的手段和方法比较单一,所论证的材料主要是语言学材料以及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基本上局限于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畴。由于研究者都是以东南亚泰族为参照系,当他们发现壮泰民族有密切关系后,即先入为主地把壮族归为泰族。因此,长期以来,壮族研究在许多外国学者眼中,只能算是泰族研究或泰学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壮学概念的产生不可能来自外部。

壮学概念的提出是人类学本土化的产物,也是对“泰学”的反正。自 20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边疆的蚕食,中国政府积极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和管理,富有爱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以忧国忧民的情怀投入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同时刊载于 1928 年 7 月号的《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周刊》的钟敬文的《僮民考略》和石兆棠的《僮人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壮族研究的标志。随后,丁文江于 1929 年《科学》杂志发表了《广西僮语研究》,魏觉钟在 1931 年 2 卷 3 期《新亚细亚》发表了《广西的民族——苗瑶僮俚》,石兆棠于 1934 年 12 月号《艺风》月刊,刊登了《柳州僮人的片断的纪述》,刘锡蕃于 1934 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壮族研究的最早论著《岭表纪蛮》,徐松石先后于 1935 年、1946 年、1947 年出版了《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发行),外国人对壮族的研究从此退居次要地位。此时的壮族研究,范围上突破了前一阶段外国人的研究,涉及了壮族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婚姻家庭及壮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田野调查兴起,实地调查材料与历史文献得到了较好的结合。以学科的投入来看,语言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紧密配合,

共同研究,使壮族研究别有洞天,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徐松石,他不仅灵活地运用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创造了“地名研究考证法”以论证壮族的历史,而且以民族的田野调查方法、语言对比法、风俗对比法对壮族的族源、历史、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但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潜心于壮族研究者人数较少,其贡献能与徐松石相提并论者,更是凤毛麟角,研究的深度不够。更重要的是,受中原汉文化中心史观的影响,即便是当时壮族研究最有成就的徐松石、刘锡蕃亦不能免。“僮佬也确是千真万确的汉族”、“僮族非但是远古岭南的土著,而且是今日最纯粹的汉人”等因汉文化中心主义偏见而导致的含混不清或自相矛盾的观点,大大局限了他们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成果的深化。因此,当时的壮族研究顶多只能是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不可能有壮学概念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实行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壮族被确认为统一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享有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随着壮族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壮族研究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到壮族地区进行慰问,随团的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壮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和现状。最著名的例子是广西分团副团长费孝通教授根据调查撰写了《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发表在《新建设》1952年第1期,运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资料对壮族的起源进行推考,认为壮族是古代东南沿海越族“余留到现在的一部分”。此后,在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和1956年开始的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都派出工作组或调查组对各地壮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整个20世纪50年代,由政府支持和组织的大规模的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了大量的资料,为壮族研究的深入开展打下了基础。在此基础

上,一批专家学者发表了一批有关壮族起源和历史发展的文章,开始了对壮族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至六七十年代,尽管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党的民族政策得不到落实,壮族研究受到了限制,历经了曲折,但没有停止,关于壮族族源、壮族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社会、侬智高起兵反宋的性质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仍在继续。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党的各项民族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推动了民族研究的发展。国内研究壮族的学术机构、社团纷纷建立,从事壮族研究的人员日益增多,壮族研究走向兴旺繁荣。论文、论著成批发表、出版,不仅加深了研究的层次,新的领域也不断开拓。在壮族渊源、社会发展史、古崖壁画研究、青铜器与铜鼓研究、语言与文字的整理研究、壮语地名的整理与研究、民间文学的整理与研究、音乐舞蹈的研究、壮族与周边民族的比较研究、壮医的挖掘与研究、壮族风俗、宗教信仰、哲学观念、伦理道德的调查研究等方方面面,几乎无一没有系列的成果。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学科的加入,使广大学者在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基础上,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壮族自古即是一个农业民族,壮族文化作为壮族人民长期适应岭南生态环境的产物,其基本性质是稻作文化,与中原汉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迥然有别。千百年来,壮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历经重组再生,发展至今,枝繁叶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共识是人们逐步打破“汉文化中心”史观进行壮族研究的科学结晶,使壮族由于长期受歧视、压迫而已趋于淡漠甚至于湮灭的民族意识逐渐复苏,从而为壮学的提出、壮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

二、壮学:全球化时代的召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冷战)格局瓦解后,历史的脚步

跨入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由于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世界舞台形成了政治、经济多元化的局面,许多取得了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怀抱着浓郁的民族情怀,以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向西方一元霸权体系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和冲击。在文化观念上,反对西方中心主义,保持和弘扬本民族文化,主张多元文化,逐渐成为时代的潮流。与此同时,由于科技的发展,交通和信息交流的发达,计算机、信息高速公路、因特网等,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整个世界,国家、种族、民族、宗教之间的接触、交流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人类之间的距离大大拉近,“小小寰球”上的万事万物,人们都可在瞬息之间一览无遗。任何与世隔绝的文化已不复存在。原来各自分立的人文世界正逐渐走向“世界一体”(One World)。“地球村”的形成不再是诗人心目中的乌托邦或文学家笔下的天方夜谭,而已是近在咫尺、可以亲身感受的现实。这就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说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或“全球同合”(Global Ecumene)。于是,一切边缘的、神秘的、鲜为人知的“非主流历史”被卷入了“主流”,每一种文化都同时处在一种多边、多向的对话过程中,既是观察的主体,又是被观察的对象。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的大门敞开,举目四顾,中华民族面对的已是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国际间、地区间的多边、多向的频繁的对话和交流,促进了对中国文化内部不同文化构成的研究。如何在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文化范围内,深入研究并准确把握其内部不同的多种构成,是关系到中国文化能否在新的形势下,全面、正确地认识自我,从容应对外来文化的挑战的重要课题。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中国文化研究从表面走向深入、从感性走向理性、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体现了新一轮文化反思的平静、理性、从容和主动性。正是由于中国学术界在新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对儒家正统文化之外的各种文化现象予以积极的关注,中

国文化的区域性、族别性研究,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壮族古称“西瓯”、“骆越”、“乌浒”、“俚”、“僚”、“徭”、“僮”等,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古代,一贯被视为蛮夷,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远离中原的“未开化”的群体,而且是一种不可与中原汉族同日而语的异类文化。《汉书叙传》曰:“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汉书》卷六十四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桂海虞衡志》则说:“南方曰蛮,亦曰西南番。今郡县之外,羁縻州洞,故皆蛮地。”尽管这一族群很早就被网罗于中央王朝之下,由于中央王朝以中原为“天子之国”的惟我独尊的心态,对壮族先民及其他周边族群的态度都是无所用心的。作为稻作民族的壮族,安土重迁,不像北方游牧民族那样周期性地侵扰中原,迫使中央王朝时常戒备,中央王朝对之更是漫不经心,漠然视之。《岭外代答》卷十云:“蛮夷人物强悍,风俗荒怪,中国姑羁縻之而已。”《桂海虞衡志·志蛮》亦云:“(邕州左右江)“其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

唐末五代,中原混战,岭南较为安定,壮族先民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宋代,侬智高统一了左右江诸洞,在屡向宋朝“求一官以统诸部”的要求遭拒绝,外受交趾侵犯的情况下,揭竿起义,反宋抗交趾,先在浔州建“大历国”,后据广源州建“南天国”,破邕州建“大南国”。起义虽然最后归于失败,但反映了壮民族要求建立自己统一的民族地方政权的意志,使后来的王朝统治者对壮族先民重视起来。侬智高起义之后,宋王朝依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洞”,推雄长者为首领,给知州、知县、知洞等官,加强王朝同左右江壮族各首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明清时代的“改土归流”意味着中央王朝着手结束其对壮族人民的“以夷治夷”和“以其故俗治”的间接统治,逐步实行新的统治模式。鸦片战争后,由于战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壮族地区的社会矛盾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尖锐局面。原有的农民和地主豪绅之间、人民大众和清

政府之间、土著与客民之间的矛盾尚未缓解与消除,各族人民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又炽热起来,法帝国主义以越南为跳板,对我国发动了侵略战争,历史赋予了壮族人民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一场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的气壮山河的斗争,使壮族的地位和作用显露出来。而旧、新桂系的兴衰,中国共产党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存在,都使传统的壮族“蛮夷”观显得陈旧、落伍、过时,甚至反动。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壮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政治地位的确立,如何认识壮族社会历史文化,以更好地开展土地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当务之急。于是,一种新型的壮族研究应运而生。但由于起步较晚,历史偏见深,马克思主义理论术语、观点的生搬硬套和中原汉文化中心论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与禁锢,致使壮族的文化特色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未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而弘扬。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为壮族研究界提供了调整既有知识模式的机会,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设西南出海通道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践,广西“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经济区位的确立,又呼唤壮族研究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已摒去汉文化中心论的观念与方法,正逐步更新的壮族研究既面临着挑战,又孕育着新的机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壮学”作为一个新兴的概念应运而生。

三、壮学:一个构建中的体系

壮学是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以壮族为核心,扩展到国内的壮侗语民族、东南亚的侗台语民族等亲缘民族及其他一切相关民族的研究,具有发散性、开放性。壮学同时又是一种视角。这种视角既有别于从中原汉文化的传统空间观念出发的传统的民族研究,也有别于西方或东南亚学者的先入为主的“泛泰”视角,采取的是整体观、比较观和相对观。因而,壮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学科,而